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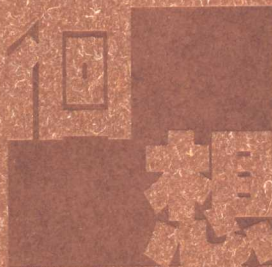


李欧梵作品系列

中西文学的

LITERARY MUSING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中西文学的徊想

李欧梵



中西文学的

LITERARY MUSING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李欧梵 著



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学的徊想 / 李欧梵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43-7002-7

I. 中... II. 李...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西方国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242 号

- 出 版 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 版 人 张胜勇
- 书 名 中西文学的徊想
作 者 李欧梵
责 任 编 辑 杨兆鑫
集 团 地 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00mm × 64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发 行 热 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版自序

我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但只出过三本文集:《西潮的彼岸》(1975年)、《浪漫之余》(1980年)和这本《中西文学的徊想》(1986年)。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海外文丛”之一,总策划是现任《明报月刊》编辑的潘耀明,责任编辑是名作家舒非(蔡嘉琪,她也是拙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的编辑)。事隔三十年,我还是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我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发现其中部分文章早在前一本书——《浪漫之余》——中已经收过了,又“再版”一次,有点像唱片公司把某位演奏家的旧版再重新包装出售,似乎有欺骗消费者之嫌。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编者认为香港的读者未必看过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书和文章,所以愿意重印,这当然是他们

的厚爱和善意。但此次再出新版,我不愿自我重复了,所以决定腰斩我的《浪漫之余》,将其中所有关于当代大陆和台湾作家的文章放入本书的前半部分,而保留本书原版的后半部分,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意旨。

我在1985年写的《初版自序》中曾对本书的内容略作解释,此处不赘述。然而我仍然感到一股凄凉:非但“五四”文学已成了过去,而且本书中讨论的几位作家,如钟理和、王祯和、高晓声早已作古。这些人的作品,有的早已成为文学经典,有的却似乎被时代遗忘了。在过去二十年间,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迁,所以这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也随着它们所讨论的作家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学术价值”也所余无多。我只能感叹,却无由自辩,只好说其保留了一点主观的见证。我也自觉是上一代人了,所以近年来对于当代海峡两岸的作家和作品不够关注,好在有令我尊敬的学者、“接班人”王德威,为当代作家写了不少权威性的评介,我甘愿做他的读者和所有后起优秀作家的读者。

我感到吊诡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年老时“落叶归根”回归中国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我适得其反,越老越不安分,虽然是用中文写作,但近来感兴趣的题目仍然是西洋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的,而且变本加厉,想用中文著书立说,讨论这类本属于我专业以外的题目。所以我有时自嘲说:“看来我还要‘欧’化一段时期,才能够听到东方的‘梵’音,再回归‘此’岸。”

读者在本书中不难看到我对于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非但数次欧游,成了布拉格的常客,而且还陆续写了数篇关于东欧的文章。今年初,老友刘绍铭约我编一个自选集(《浪漫与偏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我忍不住又把这些有关东欧的文章一股脑儿全部放了进去。其实还有两三篇曾在台北的报刊登载过,但至今连原稿也找不到了,否则理应放在本书中补遗。

我为什么对东欧和捷克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至少与两个人有关:普实克和昆德拉。前者是我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后者是我最仰慕的当代欧洲作家(他久居法国以后的作品,我反而失去了兴趣),二人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况且普实克的命运,还和中国文化切身相关,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启蒙人物之一,我曾在长文《布拉格一日》中特别提到他,并故意和卡夫卡——我在大学时代最敬仰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而昆德拉呢?他的早期小说当然令我想到了中国,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提到他,据说其中一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的一个学报转载后(是徐迟先生安排的),还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讨论。至于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则给了我接触捷克文的唯一机会,在我的心路历程中弥足珍贵。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功力再写一篇关于捷克的作曲家雅那切克的评论文章;还有另一位作家赫拉巴尔(Hrabal),我也曾看过他

的几本小说,也应该写点观感。看来我和捷克以及东欧文化的缘分还没有完。

如果找到遗失的三篇文章,我还会加注说:第一篇《费心生教授语录》纯属虚构,但主人公的影子则出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捷克同事、教我译塞弗尔特诗的什韦科夫斯基教授;第二篇《蓝胡子的城堡》纯系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观赏一出歌剧(配以唱片)时的幻想;而《双城记》中游历东西柏林的经验,一是写实,一是虚构。在初版《中西文学的徊想》中尚附有两张和几位朋友同游西柏林的照片。多年后(2004年5月)我与妻子同游欧洲,我特别带玉莹去看我当年流连忘返的两个城市——布拉格和柏林,而东西柏林之间的那道墙也只剩下一小块供人凭吊了。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我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东方的香港和大陆,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年轻的一代人往前(钱)看,而我处处在学本雅明笔下的天使,背着“进步”的时代之风前行——面向后看。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所显示的,就是这种“直面后看”的产物,也算是个人的一种历史记忆吧。

2005年6月30日于大连旅次

初版自序

这个“选集”，不能算是一本书，只不过收集了我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又从两本已出版的文集中抽出了几篇旧作，又加上一篇访谈，勉强拼凑而成。

我虽在美国学术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这本集子也不能称为“学术著作”（虽然有些文句难免沾染上一点“学究气”），因为我的研究工作不足，论点也不够严谨。

如果套用“杂文”这个名词把它归类的话，又觉得对我所崇拜的鲁迅先生有点不敬。所以，这个集子在形式上实在是相当不成体统的。

不过，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倒自有其一致性，反映出我近年来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国特别是大陆的当代文学；世界

特别是东欧与南美的文学。而这两个主题,在我的心目中往往是互相融会的,并且后者对于前者更具有启发性。

从内容上的这两大前提来看,我倒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二道贩子”(这是一位大陆作家赐给我的一顶“帽子”,我反而引以为荣):我虽然只对美国学生“贩卖”中国文学,然而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倒是不分中外,甚至于把我所心慕的两种外国文学——南美的和东欧的——强加在中国文学作品上,这是我故弄的“玄虚”。至于我这种贩法是否有价值,或能否行得通,我非常热切地期待读者的意见和批评(但请仍以这些“作品”为主,不必对“作者”作人身攻击)。

二十多年来身在海外,由于环境的影响,我始终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甚至变成了一个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经过一番“认同危机”之后,终于感到还是应该面对现实,直“认”不讳;就个人的心态和今后的取向来说,我觉得也不必在这个文化的夹缝里自哀自怜了,而应该更肯定自己的“边缘人”的地位,向中国文学的“内陆”做点积极的批判工作,也许由此可以有所建树,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提供一些文学和思想上的灵感,那么,这本集子也就不浪费篇幅或读者的宝贵时间了。

这本集子定名为“中西文学的徊想”,也许在中文用词和语法上不太恰当,然而我的一个知心朋友却觉得颇有意义:事实上,我的种种想法,都是自己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而辗转“徊

溯”的产物。

虽然有“徊想”，但目前并不能成定论，这当然和我目前的心绪有关：我虽已人到中年，但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不惑”之境，思潮仍然起伏不定，看问题的观点当然更不能统一，且随着自己的阅历变异。我自认为是一个“开放型”的人，所以更时时督促自己吸收新知，广征不同的意见，以便修正自己的思想。

我这种“徊想”式的心路历程，注定是曲折迂回的，也不一定有始有终，甚至这篇序言，也不能算是什么“开章明义”之作。我今后还会断断续续地写下去。

依照序言的惯例，我在此先向所有关心、爱护和批评我的朋友致以诚恳的谢意。

1985年7月23日于衣阿华城

目 录

- 1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 25 浪漫之余
- 35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 69 “五四”文学与鲁迅
- 82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反讽意义
- 96 一支小调谱成的文学新曲
- 111 奇幻之旅
- 120 伟大作品的条件

- 132 作家与作家
- 137 语言与沉默

151 “东欧政治”阴影下现代人的“宝鉴”

164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弗尔特

181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敲醒了什么？

187 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207 技巧与视界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五十多年的时间,使“五四”成了历史,也把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代:“五四”时代和“60年代”。从“60年代”的立足点看“五四”,所能得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视野(vision)和角度(perspective),但却并不是全然客观的,因为我们都是“五四”时代人的子女,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都离不开“五四”的影响。也许此时全盘整理“五四”的“文化遗产”,为时尚早,但是由于五十多年来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这一代也该对上一代有所感触。

—

我觉得“五四”对于中国影响最深的不是科学,而是文学。

五四运动本身是学生运动,由“五四”而引起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则与文学——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呼的“文学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在“五四”以后的十年间,白话文风行,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创刊,文学团体纷纷成立,而又集中在两大城市:起先是北京,后来是上海。风气首开于此二城,但迅即风起云涌,传遍各省,于是重要的省城重镇如广州、长沙、武汉、济南、杭州等地,也成了“新文学”的中心。“五四”文学界的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双城记》,但也可以像晚年的鲁迅一样,住定上海,专看这个上海“文坛”——这个众星群集、五花八门的十里洋场——上的“才子加流氓”。

鲁迅当年虽然骂的是创造社,用“才子加流氓”一语也未免刻薄,但他的绍兴师爷的一支尖笔,毕竟勾描出一个文坛上的重要现象——“文人”。本文所论的主要对象也是上海的“文人”。

“文人”由何而来,这个现象何以衍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就“五四”后十几年间的上海而言,如何才能够格当“文人”,却是显而易见的。“文人”不似古时候的乡绅,至少要混一个秀才头衔,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文人”,大多是自相命名的,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文人”的经历,可以简略地描写如下:

他(或她)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东南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过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念过四书五经。少

年时候,新式学堂在省城成立了,于是他(她)奋而背井离乡,甚至不顾由父母之命所订下的旧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些新式中学里,他(她)开始念英文,学几何、算数、矿冶,但课余却看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未几民国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来,剪了辫子、闹学潮、写情书,他(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往往是中学时代新派的国文教师。《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五四运动一起,全国响应,于是他(她)禁不住内心的热情,开始用假名投稿,初试省城报纸的文艺副刊,登出一两篇短文后,他(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文学杂志,也逐渐有了他(她)的文章。这个时候他(她)已经是省城文艺界的名人,也许已经改了名字,弃本名以笔名行,甚至自己也在办文学刊物。最后,他(她)毕竟向往上海的文坛,于是辗转借债,终于乘船到了这个大都市,住在朋友服务的某个书局的阁楼,或者也可由朋友介绍,拿一张名片、一篇近作,到法租界去拜望某大名人,如蒙提拔,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他(她)就顿时挂上了“文人”的雅号,赚来的稿费也花在酒楼酬酢之中,于是,他(她)成了上海的“文人”。如果他(她)家里有钱,有办法到日本、美国或英国、法国跑一趟回来,那么他(她)更不同凡响,非但是“文人”,而且是“名人”了。

虽然常言“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上海文人间之“相轻”,却反映出另一种新的现象。当然,文章是自己的好,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人,却要在自己的文章内,加上不少名词,以表示自己之“新”,恰如上海时髦的绅士淑女们,要在中国长袍内穿西装裤,旗袍领要高,以示潇洒、旖旎、合乎潮流。这些新的文学名词层出不穷,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早期“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小伙子”们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人性主义”、“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烟土披里纯”到“奥伏赫变”,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上海的文人非但“相轻”,而且也非常“自重”——自以为是,自以为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以为自己的挣扎奋斗、心理上的煎熬、感情上的折磨不被当时人特别是其他“文人”所了解和体恤。于是,文坛上充满了“倾诉”性的文学作品:日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章衣萍的《倚枕日记》、徐志摩的《志摩日记》,以及后来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书信或情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纪念碑》)、自传(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沈从文的《沈从文自传》)、传记(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游记(孙伏园、郁达夫、朱自清的游记)、随笔,以及无以计数的“新诗”。这些作品,大都以作者自己为“主人公”,自己也就是“英雄”。英雄不受知于时代(虽然自己的日记却一版再版)是一个共通的主题——由于社会紊乱,生活不安定,以及对政治的不满,遂导致各式各样“自哀自怜”的现象:郁达夫酗酒,鲁迅自嘲,徐志摩自筑“象牙塔”

(《翡冷翠的一夜》、《巴黎鳞爪》),张资平、叶灵凤写半黄色的小说,李叔同出家。

这种种颓废、逃避、自哀自怜的现象,虽各有其个人的原因,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个人小问题的背后却隐现着一个“时代”的大征象: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郁达夫在一篇短文中把这个现象很沉痛地道了出来:

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做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①

①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见《茑萝集》,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192~193页。